**外交学院2022届**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四号宋体，加粗）**

**涉华问题上美国亚太盟国对美追随程度的差异性研究**

**（2013-2021）**

**（小一宋体，加粗）**

**专 业：国 际 关 系**

**方 向： 当代国际关系**

**导 师：凌胜利 副教授**

**作 者： 李 航**

**（三号宋体，加粗）**

 **答辩日期：2022 年 5 月 25 日**

**（四号宋体，加粗）**

独 创 性 说 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 外交学院 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签字日期：2022年 5 月 15 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 外交学院 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提供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 外交学院 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2022年5月15日 签字日期：2022年5月15日

# 摘 要

**（一级标题三号宋体/Times New Roman，加粗，居中，段前间距一行，断后间距一行）**

（正文小四宋体/Times New Roman）

亚太联盟体系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和遏制主要对手的重要工具。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越来越需要借助亚太盟国的力量来对抗中国，因此在政策上对亚太盟国也日益重视。面对美国的拉拢和施压，美国亚太盟国在南海问题、“一带一路”建设和华为5G建设等涉华议题上却表现出不同的战略选择，对美追随程度也各有差异。既有研究从威胁认知、国家利益、国内政治、联盟政治、国际体系、新古典现实主义等视角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对于亚太盟国在不同议题领域的对美战略追随差异性分析还有待加强。

**关键词：**美国亚太联盟；对美追随程度；竞争感知；战略依赖；共同利益

# Abstract

The Asia-Pacific alliance system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maintain global hegemony and contain major rivals.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creasingly needs to rely on the strength of its Asia-Pacific Allies to counter China, so it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its Asia-Pacific Allies in policy. In fac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wooing and pressure, its Asia-Pacific Allies have shown different strategic choices on China-related issues such as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Huawei’s 5G construction. And their degrees of bandwagoning the United States are also different. Existing studies have conducted useful discus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reat perception, national interests, domestic politics, allianc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neoclassical realism. However,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bandwagoning the US between Japan, Australia, South Korea,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in different issues needs to be improved.

**Keywords:** Asia-Pacific Alliance; Degree of Bandwagoning the US; the Perception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Strategic Dependence; Common Interests

**目 录**

[摘 要 II](#_Toc103363948)

[Abstract III](#_Toc103363949)

[绪 论 1](#_Toc103363950)

[一、研究问题 1](#_Toc103363951)

[二、研究意义 2](#_Toc103363952)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2](#_Toc103363953)

[四、研究综述 4](#_Toc103363954)

[第一章 追随理论的回顾与扩展 13](#_Toc103363955)

[第一节 追随理论的基本观点 13](#_Toc103363956)

[第二节 追随理论的评估 18](#_Toc103363957)

[第三节 对美追随程度的界定与衡量 19](#_Toc103363958)

[第二章 美国亚太盟国对美追随程度变化的逻辑 22](#_Toc103363959)

[第一节 竞争感知 22](#_Toc103363960)

[第二节 战略依赖与对美追随程度 27](#_Toc103363961)

[第三节 共同利益与对美追随程度 31](#_Toc103363962)

[第四节 理论框架 33](#_Toc103363963)

[第三章 案例一：南海问题 36](#_Toc103363964)

[第一节 美国南海政策的内容 36](#_Toc103363965)

[第二节 美国亚太盟国对中美南海竞争的感知 42](#_Toc103363966)

[第三节 南海问题上美国亚太盟国的对美追随程度 45](#_Toc103363967)

[第四章 案例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58](#_Toc103363968)

[第一节 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政策 58](#_Toc103363969)

[第二节 美国亚太盟国对中美基础设施建设竞争的感知程度 64](#_Toc103363970)

[第三节 “一带一路”建设中美国亚太盟国的对美追随程度 65](#_Toc103363971)

[结 论 76](#_Toc103363972)

[参考文献 79](#_Toc103363973)

[致 谢 92](#_Toc103363974)

# 绪 论

（中英文摘要、绪论/序/前言/引言、结论/结语、参考文献、致谢都不加序号）

（每一章（或部分）必须另页起）

（从绪论这一页开始标注页码，目录可自动生成）

## 一、研究问题

**（二级标题四号宋体/Times New Roman，加粗，居中，段前间距一行，断后间距一行）**

亚太联盟体系是美国维持亚太地区主导权和推进地区战略的重要工具。由于中美战略竞争，美国愈来愈重视亚太盟国在涉华议题上的步调一致。然而，同为美国的亚太盟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五国在涉华议题上的对美追随程度却存在很大差异，如对“印太战略”的配合程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接纳态度、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等。现有研究大多是专门研究各国的对美追随程度，但对其差异性的原因分析不够，特别是其在不同议题领域差异性的原因研究甚少。

## 二、研究意义

这一选题兼具学理和现实意义。在理论层面，现有研究大多是分析美国亚太盟国在中美之间的选边站队或对冲战略，但对各国战略追随的分析则较为有限，特别是对其在不同领域的追随差异研究甚少。因此，本文延伸了联盟研究的领域，如完善了对于联盟追随差异性的研究，提出了各国应对联盟主导国的战略行为。本文还对一些变量的衡量方式进行了改进，如认为对共同利益的衡量应同时关注两国利益的契合度，以及相关国家对不同利益的关切程度；对联盟中安全依赖的衡量可以根据国家相对于潜在对手的军费开支占比。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一）研究方法**

自三级标题开始，标题要空两格

论文章、节、目的编号，采用汉字序号分级编号，例如：一、…（一）…1.…（1）…①…

本文遵循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在写作过程中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案例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两种。

**1.案例分析法**

由于美国亚太盟国对美追随主要体现在安全和经济两个领域，因此本文选取了这两个领域的典型案例——南海问题和“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衡量在特定议题上美国亚太盟国对中美竞争的感知程度、对中美两国的战略依赖程度、和美国的共同利益，来分析他们对美追随程度的变化情况。如果案例分析与国际政治现实保持一致，则可以有效验证本文提出的核心假设。

# 第一章 追随理论的回顾与扩展

## 第一节 追随理论的基本观点

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一种普遍行为，追随政策一直被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所青睐。由于联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所作出的关于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1]](#footnote-1)因此其必然伴随着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如果联盟内部存在以一国的政策为主，而其他国家支持与配合的现象，则可以把这些国家的行为视为对主导国的追随。特别是在一组不对称联盟中，中小国家的追随行为往往被视为联盟政治的常态。目前，学界在“追随”的内涵、国家采取追随政策的动因、追随与制衡的区别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总体来看，较激烈的分歧也同时集中于此。

### 一、“追随”的内涵

国际政治中较早提出“追随”概念的是美国学者昆西·莱特（Quincy Wright），他认为追随（Bandwagoning）就是“加入更为强大的一方”。[[2]](#footnote-2)作为较早全面阐释“追随”概念的学者，沃尔兹（Kenneth Waltz）也基本认同莱特的概念。[[3]](#footnote-3)真正引起关于“追随”概念争议的是沃尔特，他在沃尔兹的基础上将“追随”进一步理解为“与危险源保持一致”，[[4]](#footnote-4)并指出，“追随涉及不平等的交换，易受伤害的国家对主导者做出不对称的让步，并接受附属者的角色，最重要的是，追随意味着愿意支持或容忍主导国的非法行为。”[[5]](#footnote-5)沃尔特的观点体现了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方面，追随等同于追随最强者，即站在构成最大威胁或拥有最大权力的一方；另一方面，追随是国家被动选择的结果，因为根据“威胁平衡”理论的分析，国家不可能主动追随一个明确的威胁来源。对此，施韦勒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评，他指出沃尔特对“追随”的理解与“投降”更相似，这极大地违背了现实主义对“追随”的传统定义，并认为“追随不应当被理解为制衡的对立面”，“国家也会为了获取权力而追随修正主义势力”。[[6]](#footnote-6)这相当于将“追随”重新定义为“追随更强者，而不是最强者”，[[7]](#footnote-7)因为修正主义国家往往不是国际社会中的最强国家。

在运用联盟追随理论来解释国际政治现实的过程中，不少国内学者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这些争论的影响。例如，韦宗友认为，“追随”是指“与霸权国或霸权觊觎者结成政治或军事上的联盟，或是在冲突中加入到霸权国或霸权觊觎者一方”。[[8]](#footnote-8)储斌也指出，“追随”的本质是“体系内实力相对弱小的行为体对体系内主导国家（霸权国）的贴靠、服从与效忠行为，也就是对霸权的扈从”。[[9]](#footnote-9)岳小颖则认为，“追随”是“和强者一方结成政治或军事上的同盟，或在冲突中加入强国一方的行为与政策”。[[10]](#footnote-10)

本文认为，任何一种追随行为都意味着对其他国家的认可与支持，而不涉及此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实力排序，只要符合国家的心理预期，对任何国家的认可和支持都可以被视为“追随”。在联盟政治中，“追随”则意味着“在既定的联盟框架下，国家对盟国外交战略的认可与支持”。

### 二、国家采取追随政策的动因

关于国家为何采取追随政策，学者们在阐释“追随”概念的同时也做出了不同解释。由于沃尔兹的理论以体系结构为核心，因此他认为“国家是选择彼此制衡还是追随强者，取决于系统的结构”。[[11]](#footnote-11)具体来说，由于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最高目标是生存与安全，因此国家倾向于加入联盟中较弱的一方，一旦有一方联盟战胜了另一方联盟，胜利联盟中的弱国就会重新寻找能帮助自己的盟国，由此会导致在胜利刚刚来临之际或是在迎来胜利后不久，胜利联盟便土崩瓦解。可以看出，沃尔兹强调追随行为产生与否的条件主要有两个：无政府状态和追求安全的行为体。

沃尔兹的理论受到了不少批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黛博拉·拉森（Deborah Larson）和沃尔特等人。柯庆生和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认为沃尔兹忽视了不同力量格局下国家行为的差异性，如在多极状态下，国家将根据对进攻防御平衡的感知，而选择推诿（Buck-passing）与捆绑（Chain-ganging）。如果一国的生存被视为维持平衡的关键，且有国家特别是大国无条件地向其做出承诺，则可能会出现捆绑行为；推诿则是一种无法维持平衡和依赖第三方承担成本的行为。[[12]](#footnote-12)

## 第二节 追随理论的评估

通过对现有追随理论的梳理，可以看出学界对于追随行为的研究几乎是与联盟研究紧密结合的，但现有的对联盟政治中追随行为的研究成果仍然存在一定问题，通过对以下几个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我们重新界定追随行为，以及衡量不对称联盟中弱国对主导国的追随程度。

## 第三节 对美追随程度的界定与衡量

结合现有研究和理论评估，本文认为联盟政治中的“追随”是指“在既定的联盟框架下，国家对盟国外交战略的认可与支持”。在本文中，“对美追随程度” （Degree of Bandwagoning the U.S.）是指美国亚太盟国在多大程度上认可美国的地区战略，并采取行动配合和支持美国。对这一概念的衡量应当同时包含价值观念和政策行动两个层面：在价值观念的层面上，通过各国政府发表的文件、声明，以及领导人讲话，考察各国对合作原则、具体议题的认识是否与美国一致；在政策行动的层面上，衡量指标主要涉及“独自开展与美国目标一致的行动”、“为美国的行动提供便利”、“开展联合行动”三个内容。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论文中的图表分章依序编码，如上图是第一章的第一张表，应标注为1-1。图的标注应置于下方，表的标注应置于上方。应注明资料的来源，如作者自制、各网站或官方数据库等。

为了厘清应对联盟主导国的战略行为，本文根据对美追随程度将战略行为分为“追随”、“中立”（Neutrality）和“不追随”三种类型，其中“追随”可分为“完全追随”（Fully Bandwagoning）、“有限追随”（Limited Bandwagoning）；“不追随”可分为“疏远”（Distancing）、“反对”（Opposing）。本文将对这些战略行为的概念进行具体的界定。

由于前文已经对“追随”做出了界定，因此“完全追随”指完全认可和支持美国的政策立场，并采取相应做法来配合美国的战略行动，这也意味着对美追随程度处于最高水平。

“有限追随”指在不脱离美国亚太联盟整体框架的前提下，对美国的外交战略持部分支持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对美追随程度处于较高水平，美国及其盟国依然会保持较紧密的合作关系，但在某些领域或议题上，双方存在一定的矛盾分歧。

关于“中立”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罗伯特·罗斯坦（Robert Rothstein）提出“中立”就是“小国为避免战争或避免卷入纯粹的大国间冲突而作出的努力”，[[13]](#footnote-13)朱耿华指出“中立”是指“除采取硬制衡、软制衡、追随、协作和地区制衡以外的行为”。[[14]](#footnote-14)就狭义而言，韦宗友和刘稷轩认为应从国际法的角度进行界定，在战争时期，“中立”就是“一国选择不参加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也不以任何方式援助或支持任何交战方”，[[15]](#footnote-15)而在和平时期实行“中立”的国家一般被国际社会承认为“中立国”。由于美国亚太盟国既不和中美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也不具有“中立国”身份，因此本文所提出的“中立”是指不支持任何一方或在两方之间“两面交好”的政策行为。

“疏远”一般被用来形容两国关系的基本态势，[[16]](#footnote-16)或对比一国政策的前后变化，[[17]](#footnote-17)但学界尚未对其做出严格的定义。刘丰和陈志瑞认为疏远实际上是一种不作为的行为，“只要存在不与任何一个大国保持紧密战略关系的行为就可被视为疏远。”[[18]](#footnote-18)因此本文将“疏远”界定为与美国的立场保持距离，在政策实施和话语表态方面都呈现差异。

“反对”指的是不认可主导国的外交战略，并明确表态或在实际行动方面拒绝配合主导国的政策行为，此时各国采取的是与追随相反的政策。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不涉及各国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各国采取“反对”的对美政策并不意味着全面否定和美国的联盟关系，也不会导致美国亚太联盟的瓦解。

# 第二章 美国亚太盟国对美追随程度变化的逻辑

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任何一国的外交政策均是体系压力和单元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在联盟政治中，联盟成员既受到国际权力结构变动和主导国战略调整的双重影响，也需要基于国内政治来决定对外政策。由于不对称联盟中主导国的支配地位，以及联盟成员与其他大国的依赖关系，因此他们对大国的战略依赖主要决定了何种因素起主导作用，即能否自主地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

## 第一节 竞争感知

从大环境来看，国际体系的结构以及该结构的变化，是国家行为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19]](#footnote-19)国际体系结构既可以塑造国家的对外行为，也可以制约国家对外政策的变更，因此体系压力是影响不对称联盟中弱国对主导国追随程度的首要因素。对于美国亚太盟国来说，对中美战略竞争的感知是构成体系压力的主要因素，而这种感知又由中美竞争强度和议题相关性决定。

## 第二节 战略依赖与对美追随程度

一般而言，依赖（Dependence）指的是为外力所支配或受其巨大影响的一种状态。[[20]](#footnote-20)依赖关系来源于各方付出代价的影响，非对称依赖关系意味着这种影响是不对等的。因此，在一个不对称联盟中，弱国和主导国也有可能形成非对称的依赖关系。具体来说，一是双方缔结或解散盟约会对彼此产生不同影响。大国缔结盟约会为小国提供有力的安全保护，一旦大国选择解散盟约，小国将不得不独自应对各种外部威胁。由于小国更依赖于联盟带来的安全保障，而非为增强联盟实力提供决定性的资源。因此，相对来说，小国解散联盟并不会严重损害大国的战略利益。此外，出于担心因未能履行联盟义务而遭受物质惩罚，小国背弃联盟的成本也会更高，因此一般不会主动提出解散盟约。[[21]](#footnote-21)二是双方的外交战略会对彼此产生不同影响。相对于小国来说，大国战略对战略预判、战略设计和战略执行等的要求更高，因此主导国势必会更加强调联盟内部的政策协调，特别是要求盟国对其提供支持和配合。同时，大国的外交战略也更容易对小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 第三节 共同利益与对美追随程度

单元因素是影响不对称联盟中弱国对主导国追随程度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主要认为国家利益是单元因素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概念，原因在于：一方面，战略利益是关乎一个国家和平发展的长远而重大的利益，[[22]](#footnote-22)任何主权国家都会遵循国家利益的要求参与国际事务，同时不同层次的国家利益也决定了国家推进政策落实的力度；另一方面，国家利益是塑造国家间关系模式的主要因素，由于各国在推动本国利益的过程中也会影响他国利益的实现，因此两国的利益关系决定了双方的关系模式。正是由于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性，摩根索认为，“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帮助政治现实主义者找到穿越国际政治领域的道路的主要路标。”[[23]](#footnote-23)具体来说，在分析美国亚太盟国的对美追随程度时，要重点关注他们与美国的共同利益情况。

## 第四节 理论框架

在对美依赖关系中，各国受美国的压力较大，并很容易被美国的政策所影响，因此更倾向于完全追随美国。在对华依赖关系中，由于中国很少迫使美国亚太盟国反对美国，因此它们与中国保持密切合作的同时，依然可以根据和美国的共同利益来自主决定对美追随程度，更多呈现有限追随、中立、疏远或反对美国的态势。在双向依赖关系中，如果各国对美国的战略依赖程度更高，则会完全追随美国；如果各国对中国的战略依赖程度更高，会根据共同利益选择有限追随、中立、疏远或反对美国。在互不依赖关系中，各国受到的体系压力较小，因此会根据和美国的共同利益多寡来自主决定对美追随程度。

**表2-1 依赖关系类型、共同利益与对美追随程度**

|  |  |  |  |  |
| --- | --- | --- | --- | --- |
|  | 对美依赖 | 对华依赖 | 双向依赖 | 互不依赖 |
| 对美依赖程度更高 | 对华依赖程度更高 |
| 共同利益>1 | 完全追随 | 有限追随 | 完全追随 | 有限追随 | 完全追随 |
| 0<共同利益≤1 | 中立 | 中立 | 有限追随 |
| −1≤共同利益≤0 | 疏远或反对 | 疏远或反对 | 中立 |
| 共同利益<−1 | 疏远或反对 | 疏远或反对 | 疏远或反对 |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第三章 案例一：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围绕南海岛礁的主权归属，以及相关海域的管辖权形成的争议。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直接争议方，在较长时期内对南海问题也不太关注，但2010年以来，美国逐渐加大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力度，并辅之以多重行动，其南海政策也表现出浓厚的“制华”色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开始重视加强与亚太盟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协调。由于美国的施压和南海问题本身的特殊性，各国在南海政策上均有所宣示，但在是否与美国保持政策一致和加入美国的联合行动上，各国基于相关因素做出了不同选择。

## 第一节 美国南海政策的内容

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的南海政策基本已转向“直接介入”。这源于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于2010年7月就美国南海政策做出的阐释，除重申美国的传统立场外，[[24]](#footnote-24)希拉里还指出，美国在尊重国际法和开展畅通无阻的商业活动上存在固有利益，支持所有国家通过合作外交进程解决争端，并认为各国应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以海洋地物特征为依据，对领土主权提出合法要求。[[25]](#footnote-25)可以看出，希拉里的讲话已明显带有介入南海问题的倾向，因为强调南海问题应适用于国际法有利于为美国介入提供道义上的借口，且美国已事实上否定了中国基于“九段线”提出的南海主权主张的合法性，在主权归属问题体现出偏袒的倾向。此外，美国之所以在东盟论坛这一多边场合提出新的南海政策，也是为了争取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立场的支持，以提高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如果说希拉里的讲话只是间接表达了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意愿和想法，那么之后美国政府的官方声明则直接体现了美国对南海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及其南海政策的“制华”特征。2014年2月，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塞尔（Daniel Russel）明确指出“中国的‘九段线’主张不以地物特征为依据，因此不符合国际法，且存在根本缺陷”，并批评中国在南海的各种行为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南海目标的担忧。同时，罗塞尔强调了两种解决南海争端的方式：一是支持索赔方利用和平的争端解决机制，如鼓励菲律宾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向国际海洋法庭提出仲裁；二是敦促中国与东盟国家尽快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准则》。[[26]](#footnote-26)2020年7月，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chael Pompeo）就南海问题发表的声明标志着美国政府完全放弃了之前的“中立”立场，其不仅公开批评“北京利用恐吓手段侵犯东南亚各国的南海主权，强迫它们放弃近海资源，实行单边统治，用‘强权即公理’取代国际法”，而且明确表示美国的立场与国际海洋法庭做出的裁决一致。[[27]](#footnote-27)拜登政府虽执政仅逾一年，但在南海政策上基本继承了前任的立场，继续利用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崛起也符合拜登政府“重建美国”的战略诉求。

根据对美国两届政府相关声明和行动的分析，可以认为这一时期美国的南海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强调“秩序和规则”

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美国高调宣扬南海问题应符合“秩序和规则”，要求各方都应按照《联合国海洋法》的规定提出主权要求，以及在现有国际制度的框架下协商解决矛盾分歧。201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提及南海问题时指出，“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损害了美国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的利益，如果参议院同意，那么美国推动国际社会遵守国际法的能力将得到加强。”[[28]](#footnote-28)这是美国首次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南海政策与规则秩序相联系。此后，美国政府各级官员在各种场合重申了这一政策目标。例如，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访问美国时，奥巴马公开表示，“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不是索赔方，美国只是想确保现有的国际规则被遵守。”[[29]](#footnote-29)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Susan Rice）在2016年访华时强调，在南海问题上，美国的首要利益是“和平解决冲突，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30]](#footnote-30)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公开场合也反复提及规则秩序，如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在首次就新政府的南海政策发表讲话时，称美国的目标是“捍卫作为东南亚和平繁荣基础的基于规则的秩序”；[[31]](#footnote-31)美国现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与菲律宾官员通话时也强调，“美国将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海洋秩序。”[[32]](#footnote-32)

## 第二节 美国亚太盟国对中美南海竞争的感知

日本和澳大利亚是美国亚太盟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美日联盟被视为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政策和全球战略的基石”，[[33]](#footnote-33)澳大利亚也成为“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34]](#footnote-34)因此在介入南海问题的同时，美国积极拉拢日澳参与南海事务，试图把两国打造成制衡约束中国的战略支点，以维持南海地区的权力均势，以及遏制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一方面，美国高举国际法旗帜，以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由，突出日澳参与南海事务的合法性和重要性，如哈里·哈里斯曾指出，为了“打击通过恐吓和胁迫来欺负小国的强国”，“美国可以和日本、澳大利亚等许多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在公海及其上空开展任何行动。”[[35]](#footnote-35)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强调共同的价值观和安全威胁、重申联盟承诺、提供军事援助等强化联盟关系，游说日澳介入南海争端，并与其统一立场，共同向中国施压。在拉拢日澳参与南海军事行动上，美国的积极态度可见一斑，如2015年1月，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Thomas）宣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未来在南海的行动是有意义的”，并表示“欢迎日本将空中巡逻范围扩大到南海，以应对中国在该地区的领土要求”。[[36]](#footnote-36)2015年10月，美国政府东亚问题顾问邦妮·格拉泽（Bonnie Glaser）表示，“澳大利亚和日本应考虑围绕中国的低潮高地开展自己的航行自由行动，以表达他们的担忧。”[[37]](#footnote-37)日澳对南海事务的粗暴干涉势必会招致中国的高度警惕和强烈谴责，中国政府曾数次强调美日澳均不是南海问题直接当事方，批评其军事活动威胁了南海的和平稳定，并敦促其尊重地区国家维护有关海域和平稳定的努力。[[38]](#footnote-38)

# 结 论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热衷于联合盟国来共同遏制中国，这在亚太地区的涉华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面对中美两国的拉拢，特别是联盟主导国——美国的施压，美国的亚太盟国却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有的国家积极采取行动配合美国，有的国家在言语上和美国保持一致，但采取的行动不符合美国的预期，有的国家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也有少部分国家直接反对美国的地区政策。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各国对中美竞争的感知程度、对中美的战略依赖程度、与美国的利益关系均有所不同。

# 参考文献

**一、中文专著**

 【1】陈志瑞、刘丰著：《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探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阎学通著：《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美】肯尼思·沃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二、中文期刊**

【1】李泽：《战略行为匹配程度与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第128—155页。

【2】韩献栋、赵少阳：《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韩国的对华战略：基于对冲概念框架的分析》，载《国际论坛》，2021年第3期，第97—118页。

【3】王振宇：《对冲与制衡：日本“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逻辑与制约因素》，载《日本研究》，2021年第1期，第30—39页。

**三、学位论文**

【1】韦宗友：《制衡、追随与不介入——霸权阴影下的三种国家政策反应》，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

【2】朱耿华：《北约介入亚洲和联盟内外追随的限度》，复旦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

**四、外文专著**

【1】Albert Hirschma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Auc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5.

【2】Robert Jervis and Jack Snyder, *Dominoes and Bandwagons: Strategic Belief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五、外文期刊**

【1】Raymond Cohen, “Threat 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3, No.1, 1978, pp.93-107.

【2】Sung Chul Jung, Jaehyon Lee and Ji-Yong Lee,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US Alliance Network Expandability: Asian Middle Powers’ Positions on Sino-US Geo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Indo-Pacific Reg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30, No.127, 2021, pp.53-68.

**六、中文网站资料**

【1】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

【2】新华社

http://news.cn/

**七、外文网站资料**

【1】奥巴马政府官网（The White House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

https://www.whitehouse.gov/about-the-white-house/presidents/barack-obama/

【2】日本外务省官网（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go.jp/index.html

【3】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八、官方文件**

【1】US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June 1, 2019.

【2】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July 2000.

# 致 谢

论文必须用A4（210×297mm）标准大小的白纸打印，可以用不褪色的复制本，应便于阅读、复制和拍摄缩微制品。正文宜用小四号字体，1.5倍行距。

论文在打字或印刷时，要求纸的四周留足空白边缘，以便装订、复制和读者批注。每一面的上方（天头）、下方（地脚）、左侧（订口）和右侧（切口）应分别留边25 mm以上。

1. Arnold Wolfers, “Alliances,” in David L.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pp.268-269.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泰国缔结的正式军事同盟，因此本文引用了沃尔弗斯对联盟较为严格的定义。注释小五宋体/Times New Roman。

文集内文章注释格式，（a）文章名不用斜体，与其后的逗号均置于引号内；（b）书名采用斜体，后面注出编者姓名和ed.，如编者系多人，则须将ed. 写成eds. [↑](#footnote-ref-1)
2. Quincy Wright, *A Study of War*, Abridged by Louise Leonard Wri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136. 英文专著注释格式，作者，书名（斜体），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页码。单页页码用p.表示；多页页码用pp.表示。 [↑](#footnote-ref-2)
3. 肯尼思·沃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134页。译著注释格式，作者，译者，《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和出版年份，页码。 [↑](#footnote-ref-3)
4. 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第18—19页。如出现重复注释，可只写作者、书名和页码。 [↑](#footnote-ref-4)
5. Stephen M. Walt, “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 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No.2, 1988, p.282. 英文期刊注释格式，作者，“论文名，”期刊名（斜体），卷号，期号，发表年份，页码。 [↑](#footnote-ref-5)
6.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1994, pp.72-107. [↑](#footnote-ref-6)
7. John A.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1, No.4, 1997, p.905. [↑](#footnote-ref-7)
8. 韦宗友：《霸权阴影下的战略选择》，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第57页。中文期刊注释格式，作者：《论文名》，载《期刊名》，年期，页码。 [↑](#footnote-ref-8)
9. 储斌：《“印太战略”视域下蔡英文当局对美追随政策解析》，载《台湾研究集刊》，2020年第2期，第26页。 [↑](#footnote-ref-9)
10. 岳小颖：《国际政治中的“追随”理论》，载《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3期，第34—35页。 [↑](#footnote-ref-10)
11. 《国际政治理论》，第133—134页。 [↑](#footnote-ref-11)
12. Thomas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4, No.2, 1990, pp.137-168. 作者如系二人，作者姓名之间用and或&连接；如系二人以上，可写出第一作者姓名，后面加et al. 表示 “and others” [↑](#footnote-ref-12)
13. Robert L. Rothstein,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32. [↑](#footnote-ref-13)
14. 朱耿华：《北约介入亚洲和联盟内外追随的限度》，复旦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1页。学位论文注释格式，作者：《论文名》，学术机构、时间、类别，页码。 [↑](#footnote-ref-14)
15. 刘稷轩：《小国安全战略选择的得与失》，载《西部学刊》，2021年第13期，第53—55页。 [↑](#footnote-ref-15)
16. 如吴兆礼：《疏远与接近: 冷战期间印美关系评析》，载《南亚研究》，2006年第1期，第32—36页。 [↑](#footnote-ref-16)
17. 如王玉主：《东盟大国平衡外交战略性疏远中国》，载《中国与世界观察》，2014年第2期，第60—62页。 [↑](#footnote-ref-17)
18. 《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第9页。 [↑](#footnote-ref-18)
19. 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杜建平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4页。 [↑](#footnote-ref-19)
20.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footnote-ref-20)
21. Brett Ashley Leeds, “Alliance Reliability in Times of War: Explaining State Decisions to Violate Trea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7, No.4, 2003, pp.801-827. [↑](#footnote-ref-21)
22. 门洪华、甄文东：《共同利益与东北亚合作》，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93页。 [↑](#footnote-ref-22)
23. 汉斯·摩根索著，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国家间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footnote-ref-23)
24.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传统立场包括：主张航行自由与地区和平稳定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反对任何索赔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在南海主权争端中不偏袒任何一方等。 [↑](#footnote-ref-24)
25. Hillary Clinton, “Remarks at Press Availabilit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23, 2010,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0/07/145095.htm>, 访问时间：2021年9月12日。

英文网站注释格式，作者，“题目，”网站名，时间，网站地址，访问时间。 [↑](#footnote-ref-25)
26. Daniel R. Russel, “Maritime Disputes in East Asi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5, 2014, <https://2009-2017.state.gov/p/eap/rls/rm/2014/02/221293.htm>, 访问时间：2021年9月12日。 [↑](#footnote-ref-26)
27. Michael Pompeo, “U.S. Position on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13, 2020, <https://2017-2021.state.gov/u-s-position-on-maritime-claims-in-the-south-china-sea/index.html>, 访问时间：2021年9月12日。 [↑](#footnote-ref-27)
28.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ebruary 6, 2015, p.13,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_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_2.pdf>, 访问时间：2021年9月12日。

英文网站出版物注释格式，出版机构，出版物名称（斜体），出版时间，网站地址，访问时间。 [↑](#footnote-ref-28)
29.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September 25, 2015,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5/09/25/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esident-xi-peoples-republic-china-joint>, 访问时间：2021年9月12日。 [↑](#footnote-ref-29)
30. Susan Rice, “Why I’m Here: The Importance of the U.S. — China Relationship,” The White House, July 26, 2016,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blog/2016/08/18/why-im-here-importance-us%E2%80%8A%E2%80%94%E2%80%8Achina-relationship>, 访问时间：2021年9月12日。 [↑](#footnote-ref-30)
31. US Embassy and Consulates in Indonesia, “Remarks by the Vice President and Indonesian President Widodo to the Press,” April 20, 2017, <https://id.usembassy.gov/remarks-vice-president-indonesian-president-widodo-press/>, 访问时间：2021年9月12日。 [↑](#footnote-ref-31)
32. 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 by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pokesperson Emily Horne o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s Call with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Hermogenes Esperon of the Philippines,” March 31,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31/statement-by-national-security-council-spokesperson-emily-horne-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s-call-with-national-security-advisor-hermogenes-esperon-of-the-philippines/>, 访问时间：2021年9月12日。 [↑](#footnote-ref-32)
33.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February 1995, p.12, <https://worldjpn.grips.ac.jp/documents/texts/JPUS/19950227.O1E.html>, 访问时间：2021年9月13日。 [↑](#footnote-ref-33)
34.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AUSMIN Joint Communique 2014,” August 12, 2014, <https://www.dfat.gov.au/geo/united-states-of-america/ausmin/Pages/ausmin-joint-communique-2014>, 访问时间：2021年9月13日。 [↑](#footnote-ref-34)
35. Ellen Barry, “U.S. Proposes Reviving Naval Coalition to Balance China’s Expansion,”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3/03/world/asia/us-proposes-india-naval-coalition-balance-china-expansion.html?_r=0%3E>, 访问时间：2021年9月13日。 [↑](#footnote-ref-35)
36. Tim Kelly and Nobuhiro Kubo, “U.S. would welcome Japan air patrols in South China Sea,” The Reuters*,* January 29, 2015,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japan-southchinasea-idUSKBN0L20HV20150129>, 访问时间：2021年9月13日。 [↑](#footnote-ref-36)
37. Bonnie Glaser, “South China Sea: US Navy mission justified by China's excessive claims,” Lowy Institute, October 2015,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south-china-sea-us-navy-mission-justified-chinas-excessive-claims>, 访问时间：2021年9月13日。 [↑](#footnote-ref-37)
38. 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就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发表联合声明涉南海、东海问题事答记者问》，2016年7月27日，来源：<https://www.mfa.gov.cn/nanhai/chn/fyrbt/201607/t20160727_8522007.htm>；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2020年7月8日，来源：<https://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007/t20200708_5419100.shtml>，访问时间：2022年1月22日。

中文网站注释格式，网站名：《题目》，时间，来源：……，访问时间。 [↑](#footnote-ref-38)